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吴 乐,靳乐山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193)



摘 要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 3 个贫困县 432 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关键词 生态补偿; 扶贫; 生计资本; 似不相关回归

中图分类号:F 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6-0055-07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8.06.008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涌现,生态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具有经济激励功能的政策工具,通过协调环境保护和建设各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有效遏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使原本脆弱并已失衡的生态系统逐步得以恢复与重建,其已成为我国协调区域利益、保障重点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脆弱的生态功能区,由于自身发展的资源不足,又要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共责任,导致其承担了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从而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因此,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区域内的贫困人口要根据其做出的生态贡献进行相应的补偿,弥补其因参与环境保护和建设而丧失的发展机会。通过现金直接补偿、生态公益岗位间接补偿等方式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可用于发展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区域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扶贫解困的效果。生态补偿把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两个目标相结合进行统筹考虑,将有助于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贫困问题,对于当前扶贫攻坚战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农户改变原本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生态补偿对农户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户的生计决策上。在基于生计思想的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1],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决策的关键因素,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组合状态不但决定了农户生计活动的选择范围,还影响着农户自我保护的生计能力强弱,生计资本减少会使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增大,进而陷入贫困状态^[2-4]。有学者指出,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配置和转换上的约束是长期影响农户脱贫的主要原因^[5]。要考察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农户生计资本的角度出发,研究贫困农

收稿日期:2017-10-18

基金项目:国家发改委西部司重点调研项目“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政策思路研究”(XBS16-A1)。

作者简介:吴 乐(1991-),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经济,生态补偿。

户的生计资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考察现有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

关于生态补偿实施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张丽等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退牧还草工程实施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发现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生计资本关系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6];杨佰林等发现西南喀斯特山区退耕区域内,从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到弃农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依次提高,特别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7];王成超等利用可持续分析框架对福建省长汀县 2000 年以来各种生态补偿措施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金补偿部分缓解了因封山育林等措施给农户生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物补偿提高了参与政策农户的物质资本水平^[8];杨皓等通过比较保定市涞水县退耕还林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发现退耕还林的实施会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产生影响,对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不明显^[9]。已有研究多是通过描述性统计或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参与政策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比较,缺乏对不同补偿方式与各种生计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无法解释政策对各种生计资本的具体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使用 2016 年 7 月在贵州省实地调研所获取的农户生计相关数据,对调研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评估,通过似不相关法研究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主要因素,重点关注生态补偿中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型间接补偿两种方式分别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项目课题组于 2016 年 7 月在贵州省黄平县、威宁县、大方县的 12 个镇、24 个村进行的实地调查。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其目前仍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宽、贫困程度较深的省份,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扶贫攻坚难度较大。另外,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的发展面临着土地贫瘠、石漠化等众多难题。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交织,亟待同时满足生态保护和扶贫解困的生态扶贫方法,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本次调查所选三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同时三县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区域性贫困程度较高,生态环境脆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较大,能较好反映当前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调查主要通过三个层面进行:一是与涉及制定、执行生态补偿政策的政府部门进行座谈,调研组先后进行省级座谈 1 次,州级座谈 1 次,县级座谈 3 次,了解当地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相关情况,以及当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二是与每个调研村的村干部进行村级访谈,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三是农户层面的入户调查,通过调研员与农户座谈的方式发放问卷获取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数据,并选择一些农户(如村干部、种养殖大户等)作为典型户进行深入访谈。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首先在每个县随机选取样本乡(镇),然后在每个样本乡(镇)选取样本村,最后在每个选中的样本村中随机选取 30 户左右农户展开调查。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432 份。

调研地主要实施直接补偿到农户的现金型直接补偿为退耕还林项目和公益林补偿,退耕还林的补偿标准为第一轮退耕还林每亩每年补偿 119.5 元,新一轮退耕还林(2015 年开始实施)每亩每年补偿 240 元。公益林补偿标准:(1)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每亩每年 15 元。(2)地方级公益林补偿每亩每年 8 元。岗位型间接补偿主要为参与生态保护项目担任相关生态保护岗位获得的工资,如担任退耕还林、公益林、天保工程项目的护林员等,岗位工资每月在 600~800 元之间,有防火季节的临时性岗位和常年固定性岗位两种,临时性岗位每年工作 3 个月左右,固定性岗位每年工作 12 个月。

2. 指标构建

(1)生计资本的指标选取和量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农户的生计资本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本文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10-14]并结合调研地的实际情况,对五类资本进行指标选取和量化。

①自然资本指标。自然资本指农户生产过程中拥有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耕地、林地、草场等,由

于调研地为南方农区,农户拥有的土地资源主要为耕地和林地,而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又分为旱地和水田两种,因此自然资本的测量指标定义为人均水田面积、人均旱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3个指标。

②人力资本指标。人力资本指农户拥有的劳动力、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等,其数量和质量会直接影响农户对其他资产的运用以及生计策略的选择,人力资本的缺乏是导致农户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把人力资本细化为家庭整体劳动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手艺情况以及劳动力参加培训情况4个指标。家庭整体劳动力的赋值根据年龄和参加劳动的实际情况确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依据专科、高中、初中、小学进行衡量。

③物质资本指标。物质资本指农户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物质工具,本文将农户家庭拥有的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本、家庭住房作为衡量物质资本的指标。

④金融资本指标。金融资本指农户在生产生活中可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主要包括:农户进行生产活动获得的现金收入,从金融机构和其他个人处获得的贷款、无偿援助。本文将农户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获得信贷的机会(包括金融机构和其他个人)和获得无偿现金援助的机会作为衡量金融资本的3个指标。

⑤社会资本指标。社会资本指农户为了进行生计活动而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在农村社区,家庭中是否有成员担任村干部体现了其在村集体中的社会地位,农户是否参与社区组织体现了农户的社会活动能力,农户在村里的亲戚情况反映了农户在村里的关系网络强弱程度。基于此,本文针对农户社会资本的衡量主要包括3个指标,分别是领导能力、参与社区组织(包括合作社、文艺队等)、本村的亲戚圈。具体指标评价体系见表1。

表1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权重和指标说明

类型	测量指标	符号	权重	指标说明
自然资本	水田	I_1	0.107	人均水田面积/公顷
	旱地	I_2	0.047	人均旱地面积/公顷
	林地	I_3	0.057	人均林地面积/公顷
人力资本	劳动力	I_4	0.008	全劳动力赋值为1;半劳动力赋值为0.5;非劳动力赋值为0
	受教育程度	I_5	0.009	文盲赋值为0;小学赋值为0.25;初中赋值为0.5;高中赋值为0.75;专科以上赋值为1
	手艺情况	I_6	0.079	家庭劳动力有特殊谋生手艺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技术培训	I_7	0.095	家庭劳动力接受技术培训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物质资本	畜禽数量	I_8	0.086	牛赋值为1;猪赋值为0.5;鸡/鸭赋值为0.25
	固定资本	I_9	0.006	家庭所拥有的固定资本项数占问卷中列举的17种资产选项的比例
	家庭住房	I_{10}	0.007	根据住房类型和住房面积进行计算。在住房类型中,混凝土房赋值为1;砖瓦/砖木房赋值为0.75;土木房赋值为0.5;茅草房赋值为0.25。在住房面积中,五间房及以上赋值为1;4间房赋值为0.75;3间房赋值为0.50;2间房赋值为0.25;1间房赋值为0。两者各占50%权重
金融资本	现金收入	I_{11}	0.059	2015年家庭人均现金纯收入/元
	借贷情况	I_{12}	0.032	由民间借贷和金融机构借贷组成,家庭有民间借贷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有金融机构借款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两者各占50%权重
社会资本	无偿现金援助	I_{13}	0.167	2015年获得政府无偿现金援助的情况,获得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领导能力	I_{14}	0.092	家庭里有村干部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社区组织	I_{15}	0.114	参加社区组织赋值为1;不参加赋值为0
	亲戚圈	I_{16}	0.036	本村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数量

在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以后,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对应的权重值,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可以有效避免人为评价带来的主观影响。熵值法的具体核算步骤参见文献[15],得出的各项指标权重值见表1。因为各测量指标数据的类型、量纲和数量级存在差异,所以在加权求和前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Z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1)$$

式(1)中: Z_{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X_{ij} 为第*i*个农户第*j*项指标的实际值, X_{jmax} 为第*j*项指标中的最大值, X_{jmin} 为第*j*项指标中的最小值。最后农户各种生计资本的评价由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值及其对应的指标权重加权求出。

(2)变量选择。结合调研地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影响的各种潜在因素分为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和政策因素三类,具体变量的设置和取值见表2。

家庭因素包括了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外出务工情况、劳动力情况、健康状况、负担比,以及家庭的地理位置。其中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外出务工情况、劳动力情况、健康状况、负担比可以反映整个家庭获取生计资本的能力大小,家庭的地理位置反映了其特定的生存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情况。

社区因素包括农户所在村的人均年收入的的对数和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两个指标。农户所在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反映了当地农户整体的生活水平以及该村的经济状况;而农户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反映了农户到公共设施完善、商品交易活跃的乡镇中心进行农林产品出售、从事二、三产业经营以及购买家庭生活用品的便利程度,其会对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和转换产生重要影响。

政策因素包括农户是否参与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参与政策的类型和参与程度。为了分别考察现金型直接补偿和岗位型间接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本文设置三个指标表示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公益林补偿和生态公益岗位的情况,分别为农户家庭拥有林地中涉及退耕还林的面积、公益林的面积以及农户是否在从事生态公益岗位。

表2 自变量设置及相关特征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因素			
年龄	家庭平均年龄	50.04	12.36
受教育程度	家庭所有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6.23	3.93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总数	4.58	1.90
外出务工情况	家庭成员中外出务工人数	0.71	0.87
家庭劳动力情况	家庭劳动力人数	2.40	1.22
家庭健康状况	家庭所有成员整体健康状况	0.94	1.36
负担比	家庭中非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	0.44	0.27
县控制变量	—	2.27	0.81
镇控制变量	—	7.09	3.62
村控制变量	—	13.65	7.30
社区因素			
到镇上距离	家庭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公里	7.78	4.23
人均年收入	家庭所在村的人均年收入对数	8.63	0.40
政策因素			
退耕还林政策户	家庭参与退耕还林政策的面积	4.16	5.95
公益林政策户	家庭参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面积	8.83	26.16
生态公益岗位户	农户是否参加生态保护公益性岗位项目	0.10	0.30

注:家庭劳动力指家庭中参加农业生产或非农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在家庭健康状况的赋值中,0表示家庭成员全部健康;若不是全部健康,则家庭总体健康情况计算方法为有轻微病症人数 $\times 1$ +丧失劳动能力人数 $\times 2$ 。

3. 研究方法

在建立指标评价体系量化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后,本文使用调研获取的农户样本数据构建生计资本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重点关注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五种生计资本,需要建立五个方程来考察不同生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因素,考虑到各生计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导致各方程之间扰动项存在相关性,如果使用经典 OLS 回归将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为了系统地减少方程间误差项扰动带来的估计偏误,提高估计效率,研究中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model, SURE)将各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方程

进行联合估计,具体回归的实现,通过 Stata14 软件进行。

二、结果与分析

1. 生计资本的量化结果

根据构建的生计资本指标框架和量化标准,得到了调研样本中参与政策农户和未参与政策农户的家庭生计资本量化结果,表 3 为政策户和无政策户生计资本的比较情况。

表 3 政策户与无政策户各类型生计资本比较

生计资本类型	生计资本值			<i>t</i> 检验
	样本总体	参与政策农户	未参与政策农户	
自然资本	0.008 2	0.009 0	0.005 6	6.05***
人力资本	0.047 0	0.044 7	0.054 2	-2.39**
物质资本	0.007 6	0.007 1	0.008 9	-1.54
金融资本	0.022 2	0.022 6	0.021 0	2.39**
社会资本	0.041 0	0.041 0	0.041 0	1.8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t* 检验用于检验均值。

如表 3 所示,从样本总体来看,调研区域内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较高,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匮乏。通过政策户和无政策户的对比发现:参与政策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比未参与政策农户低,其中,政策户的自然资本水平显著高于无政策户,这主要是因为农户参与政策后拥有了更多的林地资源,而林地资源在农户自然资本评价指标中的权重最大,所以其自然资本水平也更高;政策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无政策户,表明之前以现金补偿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没能很好地帮助农户进行人力资本建设,农户放弃原有的农业生产活动后,缺乏相应的非农技术培训,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缓慢;政策户的金融资本水平高于无政策户,这可能是因为政策户获得了补偿资金,家庭收入提高,以至于金融资本水平较高;参与政策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和未参与政策农户一样,说明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没有产生明显影响;政策户的物质资本均值低于无政策户,但是没有通过 *t* 检验。

2. 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模型来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并着重考察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影响。把农户的五种生计资本量化值作为因变量,以表 2 中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和政策因素包括的各项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似不相关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4。

如表 4 所示,生态补偿政策主要对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对物质资本的影响不明显。具体而言,现金型直接补偿中的退耕还林政策主要对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正向影响,其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不明显;公益林补偿政策主要对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对其他资本的影响不显著。生态公益岗位型补偿主要对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其对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响不明显。综合来看,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从不同方面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在家庭因素中,家庭平均年龄对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其他资本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家庭成员平均年龄主要与家庭整体劳动生产能力有关,家庭的劳动生产能力随着家庭平均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而家庭收入与家庭劳动能力直接相关,随之同向变化;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说明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其对农户用于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源积累和可利用的社会网络构建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支持其进行更多样化的生计活动,收入渠道较多,所以家庭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更丰富。同时,学历更高的

人和生产技术熟练者往往更有机会在村内担任干部或作为社区组织的管理者,所以社会资源较为丰富;家庭规模对农户的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自然资本有负向影响,说明规模越大的家庭,其收入渠道也更多,所以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家庭人均土(林)地资源则较少;家庭外出务工情况对物质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如果选择外出务工,那么主要的生计策略选择即为非农劳动为主,其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主要位于乡镇以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则对于农村老家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工具就会减少投入,家庭物质资本水平因此下降;家庭负担比对自然资本有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家庭非劳动力越多,则家庭对外流转土地的可能性也提高,自然资本因此减少;家庭劳动力情况、家庭健康状况对所有生计资本的影响都不明显。在地理因素中,县、镇、村三个控制变量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产生了一定影响,这表明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如交通便利程度、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等)也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社区因素中,农户家庭到镇上的距离对人力资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距离区域内发达中心的远近程度是影响农户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社区人均年收入水平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对于医疗和教育的投入更多,同时对于区域内社会网络的构建也较为重视,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而经济发达地区较为普遍的土地流转行为可能是其对自然资本存在负向作用的原因。

表 4 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自然资本 (N)	模型 2 人力资本 (H)	模型 3 物质资本 (P)	模型 4 金融资本 (F)	模型 5 社会资本 (S)
家庭因素					
年龄	0.000 1	-0.001 1***	-2.84e-06	-0.000 3*	-0.000 2
受教育程度	0.000 1	—	0.000 2**	-0.000 6	0.005 1***
家庭规模	-0.001 2*	0.000 5	0.000 2	0.003 5*	0.004 6
外出务工情况	-0.000 2	-0.004 7	-0.000 8**	-0.000 1	-0.006 5
家庭劳动力情况	-0.001 2	0.007 8	0.000 6	-0.004 1	-0.001 7
家庭健康状况	0.000 4	-0.002 8	-0.000 2	0.000 4	-0.002 3
负担比	-0.010 7**	0.009 5	0.000 3	-0.004 2	-0.010 1
县控制变量	-0.011 0***	-0.003 9	-0.001 9*	-0.016 7**	-0.005 9
镇控制变量	-0.004 8*	0.011 5	0.001 7	0.016 3**	0.005 5
村控制变量	0.002 5**	-0.005 0	-0.000 6	-0.006 8*	-0.003 2
社区因素					
到镇上距离	-0.000 2	-0.002 2***	4.67e-06	-0.000 4	0.000 1
人均年收入	-0.004 3**	0.016 5**	0.000 8	0.003 2	0.013 8*
政策因素					
参与退耕还林面积	0.000 6***	-0.000 3	-0.000 1	0.001 1*	0.000 6
参与生态公益林面积	0.001 7***	-0.000 4	-0.000 1	0.000 5	0.000 6
生态公益岗位	0.000 1	0.002 4**	0.000 1	0.000 1	0.003 3***
R ²	0.359 9***	0.154 1***	0.083 6***	0.063 7**	0.203 7***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由于人力资本指标包括了受教育程度,在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模型中没有包括以上指标。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了调研区域内农户的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整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第二,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项目主要对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生态公益岗位型补偿主要对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进行生态补偿探索,并且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由于原有的政策设计中更多的关注于相应的生态系统保护状况,对减贫的考虑不足,许多

政策主要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情况作为补偿依据,导致拥有自然资源较少或不拥有自然资源的许多贫困农户被限制在政策门槛之外,难以从参与政策中获益,造成了生态补偿扶贫的现实困境。

自2014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活动,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以及脱贫需求,弄清楚了到底“扶持谁”的问题,这也为生态补偿扶贫困境的破解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基于识别出的贫困人口,优先让其担任生态公益性岗位的岗位型补偿是有效突破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有效手段,可以更好地实现政策对贫困人口的瞄准。而且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所以在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各类生态保护区应进一步增加完善生态保护公益岗位的设置,鼓励国有林场、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单位,优先聘用周边贫困农民从事生态保护岗位,将促使更多的贫困人口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公益岗位要求农户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而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多样,不一定都能适合生态保护岗位,如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就不一定能进行巡山、防火等工作。因此,基于贫困人口不同的致贫原因,探索建立包括资金补偿、担任生态保护岗位、就业技能培训、产业补偿等多种方式在内的综合补偿方式,将是生态补偿扶贫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M]. Lond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 [2] 何仁伟. 山区聚落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J].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 2014(2): 221-230.
- [3] GLAVOVIC B C, BOONZAIER S. Confronting coastal poverty: building sustainable coastal livelihoods in South Africa[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7, 50(1): 1-23.
- [4] 宁泽遼.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86-94.
- [5] 李聪, 柳玮, 黄谦.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4(6): 106-112, 126.
- [6] 张丽, 赵雪雁, 侯成成, 等.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冰川冻土, 2012(1): 186-195.
- [7] 张佰林, 杨庆媛, 苏康传, 等. 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退耕决策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2): 170-180.
- [8] 王成超, 杨玉盛. 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分析[J].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3(4): 53-60.
- [9] 杨皓, 王伟, 朱永明, 等. 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河北省以保定市涞水县为例[J]. 水土保持通报, 2015(4): 263-267, 270.
- [10] 赵雪雁, 张丽, 江进德, 等.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3(3): 531-542.
- [11] 赵文娟, 杨世龙, 王潇.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1): 136-143.
- [12] 李慧玲, 马海霞, 杨睿. 棉花主产区棉农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疆玛纳斯县和阿瓦提县的调查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5): 57-63.
- [13] 张军以, 苏维词, 王腊春. 中国生态修复建设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综述[J]. 生态经济, 2018(1): 180-185.
- [14] 吴乐, 靳乐山.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贵州省三县的实证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8): 1-7.
- [15] 曹淑英, 徐秀英, 吴伟光. 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J].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2017(1): 161-169.

(责任编辑:金会平)